

民族志知識生產中的異性戀現象：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婚前同居的傳統*

Maria Mayerchyk 撰 歐陽翠鳳 譯

[提 要] 本研究旨在對受關注越來越多的異性戀構建研究做出貢獻。本文從後結構主義視角出發，審視 19 世紀晚期至 20 世紀早期婚前同居傳統的民族志知識的產生。首先，本文分別考察提倡性純潔的浪漫民族主義方法，揭示性關係的激進與解放的方法、建構超性化的“野人”的殖民主義方法以及強調脅迫和未經同意的性行為的女性主義方法。其次，本文以 19 世紀烏克蘭民族志彙編為基礎，從酷兒理論出發，探索主位語義系統，以便理解如何超越現代性的性及（異性）性行為理念來認識肉體快感的婚前實踐。同時，本文把非現代性的思維模式與範式和現代性的思維模式與範式分離開，考察了民族志學者如何生產知識，又如何把（異性）性行為的現代理念強加於鄉村的語義體系，對其進行去歷史化的闡釋。

[關鍵詞] 知識生產 非現代性性行為（異性）性史 19 世紀 婚前親密關係 烏克蘭

[中圖分類號] C9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105-12

一、關於婚前同居的傳統

許多民族志告訴我們，在 19 世紀的歐洲鄉村，年輕人被允許婚前同居。這種習俗在很多民族文化中流行，包括白俄羅斯、保加利亞、法國、丹麥、德國、挪威、瑞士、塞爾維亞、俄羅斯，以及其他地區。本文主要旨在考察 19 世紀烏克蘭鄉村文化，那裡的年輕人也被允許婚前同居。

在烏克蘭，年輕人會舉行一種聚會，人們稱之為“維奇爾尼”（vechirnytsi）“多斯維基”（dosvitky）（這兩個詞都用複數，其詞根都有“一個晚上”“天亮之前”的意思）“弗洛伊西”（vulytsi 街道），等等。女孩們聚在一間農舍紡織刺繡。未婚的小伙會走過來和少女開玩笑、嬉戲，通常他們會和少女們度過美好時光。有時候，少女們聚在一起只是為了開心，既不做編織，也不做刺繡。少男少女們在一起度過一個夜晚之後，便會成雙成對地同居。一篇北烏克蘭民族志記載道：

* 本論文得到“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中青年教師發展計劃訪問學者專項資金項目”（贛教辦函〔2016〕109 號）資助，係江西省研究生教改項目《〈當代西方文論〉的教材建設》（項目號：JXYJG2015-057）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斯威夫特與古今之爭研究》（項目號：16BWW051）的階段性成果。

村裡年輕的姑娘小伙常年都會舉行聚會，籌辦娛樂活動。不過，年輕人認為，春天和夏天是一年中最好的聚會娛樂季節。在每個村莊，人們都能聽見姑娘的歌聲。隨後，小伙子們會加入她們的行列，和她們一起在街上或是在附近的草坪上唱歌、嬉戲和聊天，一直玩到晚上很晚的時間。然後，他們成雙成對地離開，來到姑娘父母的房子裡過夜。正如當地的村民所說的那樣，這些姑娘小伙成對地躺在床上。^①

有時候，年輕人也會睡在他們聚會的地方。有時候，年輕人會避開其他人，在乾草堆或者閣樓找一個舒適的地方躺下過夜。但是，姑娘也會等家人睡熟之後，在父母的房子裡或是附近的地方，和小伙子在一起過夜。

烏克蘭南部的報道記載說：“姑娘會找機會和小伙子在地窖或穀倉裡一起過夜”。如果姑娘有自己的臥室，她會讓小伙子從窗戶鑽進她的臥室，他們或者在花園、乾草堆上鋪床睡下。^②

在黎明之前，小伙子在其他人（特別是女孩的父母）起床看見他們睡在一起之前離開姑娘。這種要求並不能錯誤地理解為男女同居是禁止的，或誤認為他們的行為是違背道德標準的。雖然小伙子黎明前要離開姑娘，該報道又說，女孩父母並不反對他們在一起過夜。^③令人類學家驚奇的是，當姑娘的父母得知他們的女兒有同居的伴侶時，他們會感到自豪和高興，而不是感到沮喪。德國歷史學家兼律師費希爾（Friedrich Christoph Jonathan Fischer）說：“姑娘的父母認為年輕人同居是很純潔的。很少見牧師會詢問農民，他的女兒是否幸福。作為父親的他很開明仁愛，他會告訴牧師，他的女兒已經接受小伙子一起過夜了”。^④在 19 世紀的烏克蘭鄉村，少男少女同居是達到結婚年齡的合法表現。一位受訪者談及她還是未婚少女時也體驗過這種風俗。她說：“好女孩就應該有一個男孩同居。否則，如果她沒有和男孩一起同居，這就只說明她還沒有被看作是成熟的少女。”^⑤

年輕人可以自由選擇更換伴侶同居。他們不必兩個人在一起同居之後，馬上就結婚。年輕人通常會和平分手。然後，男孩和女孩又會和新的伴侶建立起新的戀愛關係。^⑥

但是，這種少男少女同居的習俗僅僅局限於某些社會階層。鄉村牧師的孩子、地主的孩子及富人家的孩子不會去參加“維奇爾尼”這種少男少女的娛樂活動，然後一起同居的。年輕人——特別是女孩，受到嚴格的保護，不會和異性有任何無控制的約會。他們的婚前行為受到各種規矩的限制，他們也不被允許去參加鄉村的男女聚會和其他娛樂活動。

二、本研究的方法論、運用的理論及歷史注釋

（一）方法論。在描述福柯的理論框架的基礎上，我認為性是一種現代話語權力制度，它與其他權力話語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如民族主義、殖民主義、自由主義和性解放。

本研究應用了女性主義的後結構方法，反對從實證主義的視角出發，分析該文化傳統問題，這種視角依賴於所謂的“客觀知識”“中性知識”，即唐納·哈拉維（Donna Haraway）所說的“上帝的眼睛所看見的東西”。^⑦本文運用唐納·哈拉維和芭拉德（Karen Barad）的“情景知識”和“部分客觀知識”的概念，認為“研究者通過對自己所處的處境或所用的研究技術進行反思，可以獲得部分客觀的知識，即研究者依據他所處的時間、空間、身體以及歷史中的位置，可以獲得他（她）所看見的部分的真實”。^⑧為了解釋 19 世紀的民族志學者為什麼要發展對婚前男女同居的不同理解，以及他們如何發展對此習俗的不同理解，本文嘗試通過考察他們的性別、種族、研究技術、政治關係結構以及與被研究文化的權利關係，定位他們的處境。

（二）一些語言注釋。本文運用歷史化的研究方法，區分了用於命名男女親密生活現象的現代

語言與非現代語言。眾所周知，“性行為”和“性”是現代社會的產物。⁹因此，本文中的“性行為”和“性”適用於現代學術話語的意義。但是，當特指語言的主位語義系統時，本文避免使用用於指性行為的現代詞匯，而是使用描述性的詞匯，如“快樂的實踐”“身體的實踐”以及主位用語“睡在一起”“遊戲”“靠在一起”和“打獵”等等。那些研究男女親密生活的歷史學家會遵循建構主義的觀點，他們研究現代文化的時候通常使用“性行為”(sexuality)這個詞及其概念。但是，“性”(sex)這個詞更多的是指它在歷史語境中的意義。比如在菲利普斯的《性行為之前的性：前現代的歷史》和雷伊的《性行為》中，“性行為”與現代歷史相協調，而人們認為適合用“性”這個詞來談論和描述前現代。¹⁰這意味著這樣的含義：不同於性行為，“性”是一個穩定的、普遍的現象。但是，也有歷史學家不同意這種對“性”的普遍意義上的理解。他們追問，“性是否一直是一個獨立於語言、語境、社會關係及社會實踐的範疇呢？”¹¹為了指出對“性”，如同“性行為”一樣的理解中的一些概念上的轉變，本文將區分一個現代概念上作為一種行為的“性”與一個非現代的“交配”的概念。

(三)歷史注釋。在19世紀下半葉，當代烏克蘭被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佔領。在這兩部分，烏克蘭文化經歷了所謂的“民族復興”的密集進程。國家領土的殖民地位、不同的社會和政治語境、全國起義對知識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沙皇時期的俄羅斯，烏克蘭民族文化研究由於1863年和1876年頒佈的兩個官方文件而停滯不前。這兩個文件禁止出版烏克蘭語書籍(貝爾斯字母除外)，後來又禁止上映烏克蘭戲劇和舞臺歌劇。這些官方禁令中止了烏克蘭的民族志研究。人們注意到，19世紀60年代初期，烏克蘭的民族志研究一直在進行。19世紀70年代以及上述兩個官方禁令實施之後，民族志研究的學術出版物的數量急劇下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世紀末，族名“烏克蘭人”和形容詞“烏克蘭的”只在俄羅斯統治的烏克蘭地區使用，在奧匈帝國統治的烏克蘭地區，人們使用自我命名的術語“魯西尼”(Rusyny)，本文使用現代的族名用語“烏克蘭人”和“烏克蘭語的”。

(四)一些民族學學科的注釋。本文所採用的“民族學”並不是西方學術界通常所說的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而是指19世紀民族興起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定的歷史學科上的說法。自19世紀末以來，農民既是烏克蘭人口的絕大多數群體，又是烏克蘭民族文化的邊緣群體。本文考察各種具體的民族學文本——包括已發表的論文、田野資料、未發表的檔案手稿，這些文本研究了鄉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民俗、儀式和習慣)，以便證明其深刻的民族根源和歷史。

在東斯拉夫學術傳統中，民族志通常與民俗學一起運作。這兩個學科的劃分是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中確立起來的，至今，這種劃分在學術層面依然存在。民族志是一門歷史學科，它研究服飾、住所、飲食等物質文化，以及儀式、信仰。民俗學是語文學的一個分支，側重研究民間文本，即民歌、故事和傳說等。本文主要運用民族志的知識考察烏克蘭文化，偶爾也會運用語文學知識。

三、一個令人不知所措的矛盾

19世紀50年代出現了第一部關於婚前同居的民族志出版物。這並不意味著在此之前“維奇爾尼”沒有被提及過，只是它並沒有經常出現在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文本中。1719年，基輔的教會法院頒佈法令，譴責鄉村的“維奇爾尼”，認為這是一種不可理喻、令人厭惡和違反道德準則的行為。¹²多個法庭案例、醫生報告及其他州代表的報告都曾提及婚前同居行為。1786年，法西西亞夫斯科尼博士——他是醫學、哲學和法律博士——在他的《切爾尼希夫牧師》中描述說：“‘維奇爾尼’極少會出現不正當或者放肆的行為”。¹³1840年以後，“維奇爾尼”被系統地加以研究。

19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 20 年代,民族志學者積累了大量的有關“維奇爾尼”的學術論文、報告,偶爾也有簡短的筆記。雖然學者採用不同的方法和視角(他們當時所能夠獲得的研究方法和框架)來研究這個問題,例如比較研究、神話分析,所有這些研究都受到現代“性”觀念的束縛。他們對於年輕人婚前是否有性行為的問題持有獨特的立場。這種存在於非現代的鄉村文化中的現代性的二元範式引發了人們的困惑。絕大多數論文聲稱年輕人之間的關係是純潔的、體面的,由此,主位措辭“睡在一起”意味著“和某人一起睡覺”。然而,一些學者用民族志資料表明年輕人之間有親密關係,因此,“睡在一起”意味著“性行為”。

實際上,這種關於婚前同居習俗的相互對立的結論阻礙了這項研究的進一步發展。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關於婚前同居習俗的研究都沒有出現新的觀點和解釋。學者們繼續在二元範式的框架內進行這項研究。在 19 世紀,這種情形一直在延續,已經建立起來的二元對立模式原封未動。當代學者僅僅堅持這種二元對立中的某一種觀點,或是同時持有兩種觀點,儘管二者是矛盾的。通常處境下,學者並沒有詳細說明為何會出現兩種對立的解釋,特別是考慮到 19 世紀的民族志學者有機會直接觀察到鄉村的婚前同居現象。

克服這一令人不知所措的矛盾只是在近期才得以實現,這得益於後現代認識論的轉向。如果這兩種觀點都錯了怎麼辦?這種可能存在嗎?如果某一種傳統的觀點只是學者們身處的環境(即他們在物質上)所帶來的結果怎麼辦?這種方法能夠幫助我們克服這一令人不知所措的矛盾嗎?

下文將追溯研究者所處的環境與他們對婚前同居傳統所持觀點之間的關係。

(一)“年輕人體面的娛樂”:民族浪漫主義、民間的體面行為和性純潔

19 世紀,民族主義是一種迅速增長的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力量。“民族復興”的進程催生了民族志和民俗學的發展。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指出,和西歐國家以哲學和歷史為民族意識的核心不同,對於中歐和東歐國家而言,民俗學是民族話語的核心。^④結果,這些民族志學和民俗學把非現代的鄉村文化轉變為現代民族神話、民族象徵和民族文化。在 19 世紀 60 年代至 80 年代期間(與其他東歐的民粹主義運動同時進行),浪漫的進步主義者和有著民族意識的烏克蘭知識分子開始密切關注農民文化,考察農民的生活方式、民間文化和哥薩克遺產(Cossack heritage),他們認為哥薩克文化遺產是烏克蘭民族身份的自然起源和建構烏克蘭民族形象的真正模式。

“民族復興”是一種多層面的現象,它既可能發展成保守權力,也可能發展成激進的左翼觀點。這兩種可能性都與烏克蘭的民族起義有關係。第一個關於婚前同居傳統的民族志研究採用了民族浪漫主義的範式。關於男女親密問題,這一學術和文化話語發展了獨特的理想化的、浪漫化的農民形象,一種清教徒似的鄉村環境觀。

美國歷史學家喬治·摩西(George L. Mosse)在他的《民族主義與性》中揭示了現代最強大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與“得體”(respectability)之間的關係,即一種表明對待性的正確態度的術語。^⑤摩西認為,在民族主義的範式中,“正確的方式”與“適當的性”已經成為人們所期待的得體與尊嚴的基礎。因此,新的關於性行為的民族得體的觀念包含了謙虛、純潔與美德。

在喬治·摩西的《民族主義與性》中,關於民族主義與性關係的論斷主要是指新出現的中產階級,即資產階級。然而,在烏克蘭文化的殖民語境中,民族浪漫主義民族志學者使用這種“得體的語言”,其目的是將“民間”從無知、罪惡、浪蕩及野蠻的形象(如俄羅斯和奧地利的醫生、旅行者、民族學家和一些本土的牧師們把烏克蘭農民階級描繪成這樣的形象),轉變為把烏克蘭農民描繪成保存著古老的民族文化和歷史的體面的農村居民。

這就是為何在 19 世紀 50 年代晚期民族志學者研究年輕人的聚會、婚前關係及農民的道德,等等。大多數出版物都承認婚前同居的傳統,它們從表明到逐漸強調這種年輕人聚會的純潔、得體的特點。幾乎所有的出版物都包含以下論斷:

“沒有哪一個男孩或女孩允許自己做有違背道德準則的不得體的事情”。^{①⑥}“儘管年輕人熱愛自由,存在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會整晚睡在一起的習俗,這些都是事實(這就誤導了許多目光短淺的觀察者),但是,戀人們幾乎從未忘記他們的義務(即,保持貞潔)”。^{①⑦}

“通常處境下,男孩和女孩會睡在聚會的房子。但是,他們從不允許彼此之間發生親密行為。相反,每個男孩會照顧他的未婚妻和保護好她”。^{①⑧}

1886 年,在總結了相關出版物和田野調查筆記後,哈爾科夫大學(Kharkiv University)教授米科拉·蘇姆索夫(Mykola Sumtsov)說:“幾乎所有提及‘維奇爾尼’的民族志學者都承認,這種習俗是年輕人的得體聚會”。^{①⑨}

研究這一習俗的民族志學者認為,父母和社區都會嚴格控制女孩的端莊行為,在婚禮儀式中,女孩要強制接受貞操檢驗,女孩婚前失去貞潔或懷孕會遭受嚴厲懲罰,單身母親和非婚生子女的悲慘命運,這些因素都保護了道德準則,有利於防止淫蕩和放蕩行為的發生。女孩們被新婚之夜的貞操檢驗束縛得如此之深,以致於只有喝醉的或極其無恥的人才會屈服於誘惑。事實上,雖然這種思維方式對許多研究者來說是很有說服力的,但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種邏輯。美國歷史學家勞拉·恩格爾斯坦(Laura Engelstein)在研究俄羅斯帝國末期末婚少女懷孕和殺嬰的研究時發現,根據統計數據,農村地區的殺嬰現象比城鎮更普遍。學者們認為,這種現象可能說明農民的道德準則比城市人的道德準則要求更嚴格,他們的公共制裁比城市未婚孕婦可能面臨的含糊不清的羞辱也更為嚴重。因此,關於嚴格控制女孩的端正行為以及嚴厲懲罰失去貞操的女孩的爭論既可以解釋為維護道德規範的因素,也可以解釋為殺嬰現象頻發的原因。

(二)“他稍微與她的身體親密接觸”:激進、解放與“現實主義”的鄉村生活描寫

從 19 世紀 80 年代末開始,在烏克蘭意識形態景觀轉型的背景下,種族中心主義的浪漫主義鄉村生活觀受到了系統性的挑戰。一些烏克蘭民族志學者,尤其是那些左翼政治的民族志學者(當時他們被稱為“激進派”)開始提倡更多的階級和性別導向的知識,堅持必須有一個更加現實的農民形象。尤其是,這意味著研究農村生活中的不那麼“浪漫”方面,比如家庭暴力、婦女的一般處境(村民們自己稱之為“一個女人的命運”)、淫穢的民間傳說和婚前關係。同時,興起的性醫學話語為一些民族志研究提供了新的框架。在性話語與民族志相互交集的基礎上,二十世紀初出現了一個名為“性的民族志”的新的學科。有一批學者以《性的民族志》為框架研究婚前同居的習俗,比如費迪·爾沃克(Fedir Vovk)、瓦爾多米耶爾·亞斯特雷博夫(Volodymyr Yastrebov),等等。

學者們獨特的政治立場和研究視角導致了他們的研究方法和學者與農民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馬爾科·胡舒夫斯凱(Marko Hrushevskyi)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胡舒夫斯凱出生於基輔地區南部,是一個執事的兒子,曾任鄉村教會學校老師。他組織了一個長期的研究鄉村文化的組織,在研究過程中,他努力按照鄉村真實的面貌描寫“真實的村莊”。從 1889 至 1900 年,他和他的夥伴們(他這樣稱呼幫助他收集資料的農民們)收集了大量包括婚前睡在一起的資料。胡舒夫斯凱說:“收集數據的最大障礙是村民互相不信任,有的害羞,有的需要生計(不能冒險失去經濟收入的來源),有的則膽小害怕”。^{②⑩}事實上,這個問題從來就不是關於體面和貞節的數據收集,而是獲得關於肉體和親密的可靠信息,這些敏感話題並不被教會認可,也不是民族浪漫主義

所認可的典範“民間”形象。這需要學者與農民之間互相信任。事實上,19世紀的民族浪漫主義學者也尊重農民,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努力與農民建立起這種程度的合作關係。

馬爾科·胡舒夫斯凱在和包括農民在內的團隊合作過程中,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不僅討論了他們的習慣,還討論了研究的目的、收集的方法、研究的結構,甚至討論了他們要寫的書名。以下是新的政治視角下的婚前同居傳統,以及新的合作式實地調查的結果:

背靠背(Prytula) 一對少男少女互相愛慕。當他們開始熱血沸騰的時候,他們走向對方,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互相觸摸對方,然後睡在一起度過美妙的時光。如果一對少男少女互相喜歡對方,又和睦相處,他們就會依偎著睡在一起。這是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的遊戲。男孩爬上女孩的身體,他們把腹部緊緊地貼在一起。他們也會想再進一步對彼此做點什麼,但是,他們又害怕人們會對他們閒言碎語,他們會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一步”,不要讓女孩失身。讓女孩失身意味著毀掉了女孩的名譽,而貞操就是女孩的榮譽。他們僅僅是在一起度過一段美妙的時光。他們背靠著背,為的是他們不會去做其他越雷池的事情。男孩不會去傷害他的女孩,因為他知道這樣對女孩很危險。這就是他們的遊戲,僅此而已。從古至今,少男少女們在結婚以前,每個人都玩這同樣的遊戲。²¹

以下引文來自赫爾松地區研究員瓦爾多米·耶爾亞斯特雷博夫(Volodymyr Yastrebov)的文章,該文基於“未婚青年聯合會”項目,討論了婚前同居的傳統。在該文中,他收集了村子裡小伙子們提供的信息,這些信息包含了以前未公開的信息。耶爾亞斯特雷博夫把完成的手稿寄給一家烏克蘭學術期刊,並於1896年發表。但文章發表之後,他發現有關年輕人婚前同居的整個段落被刪除了。²²於是,耶爾亞斯特雷博夫把文章的副本寄給了一家法國研究有關性文化民俗專題研究的雜誌。1898年,該文章的法文譯本被刊登在雜誌的烏克蘭性文化民俗專欄:

男孩到了一定年齡會選擇一個女孩同居,並親自或是通過朋友向她求婚。如果女孩接受了男孩的求婚,人們會說:“她被他弄濕了。”如果女孩拒絕了求婚,人們會說:“她已經乾了。”當男孩發現女孩喜歡他時,他就會撫摸她的胸部和私處,最後“打獵”(go hunting)。這就是如何保護女孩童貞的特殊方式。女孩結婚前需要是“完人”。顯然也有例外,但是這種處境極少發生。²³

這就是民族志學者對婚前同居傳統得出的不同結論。即使是幾乎同時、而且經常是在同一地區所做的研究,由於研究者所持的觀點、政治立場和研究技術的不同,也會對同一習俗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儘管這兩種方法都聲稱完全“客觀”,但它們也可能會受到質疑。對於研究人員來說,沒有中立的立場(他們的視野總是取決於他們所處的環境),沒有中立的研究技術,也沒有中立的研究目的。因此,沒有完全的客觀性。然而,這兩種互相排斥的解釋同時可以被認為是部分客觀的。

比如,我們必須承認,由性純潔倡導者提出的對婚前同居傳統的解釋是非常準確的,只要這種解釋符合婚前同居習俗的主位的含義。農民們認為,年輕人之間的婚前關係是得體的、安全的,因為童貞的重要性、基督教的價值觀和民間婚禮習俗要求少女做貞操測試,在確保年輕人不會去違背規則方面起到了根本作用。這意味著民族主義者對這種婚前同居風俗的看法與農民的語義系統是一致的,因此,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性話語的支持者的推理也不是非理性的,只要“背靠背”遊戲假設(如果我們借助性的現代詞匯來表達)“性喚醒”“性快感”“生殖器刺激”“撫摸”“部分滲透”等有時會導致婚前懷孕和性疾病的傳播,毫無疑問,民族志學者有理由相信農村的婚前關係是和性行為相關的。由此,雖然這兩種觀點是彼此矛盾的,但是,更精確的方法是

他們描述為同時部分客觀的,而不是哪個正確,哪個錯誤。

如果我們承認這兩種觀點的部分客觀性以及部分客觀性與研究者所處的情景之間的聯繫,我們就會認識到知識總是政治性的。如果知識是從特定的關係結構中產生的,那麼它總是政治性的,帶來特定的政治結果,並且設定特定的未來。

由性純潔的倡導者所創造的浪漫化的民族中心主義知識,部分地與 19 世紀末反現代主義敘事對性不純的現代性批判方面產生了共鳴。在 21 世紀,新保守主義運動再次拾起了這一知識,他們反對性別政治、少年司法制度,認為人權政治違背了“國家價值觀”。

性自由與性解放範式所闡釋的知識在權力話語的發展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促進了現代性話語的歸化和去歷史化。依附於現代性觀念——以強調異性行為規範——以民間非現代習慣為基礎,民族志知識構成了永恆的、非歷史的、普遍的、穩定的性。然而,這種方法有可能削弱國家的浪漫化、理想化和神聖化。難怪這些文章在國內期刊上不受歡迎。正如人們所注意到的,上面提到的關於婚前同居的論文經常翻譯成外語在國外出版,有時是用匿名出版的。

但是,19 世紀的民族志知識對後現代方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性別與性的現代體制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的證據。

(三)“山區人口的道德是一個非常值得關心的問題”:殖民主義的凝視

乍一看,性取向的支持者似乎坍塌成了殖民神話,它把村民描繪成“淫亂的、過度放縱的野蠻人”。但是,在外部的殖民方法和“內部的國家”方法之間存在本質區別。從屬的被殖民文化以及特定的政治地位形成了與殖民文化不同的結構視角的語境。提倡性取向的人在堅持國家範式的同時,概述了性行為,但並不一定反對農村居民習俗的貞潔和正直。學者們對傳統習俗不作任何道德評價。這似乎前後不一致,而且,烏克蘭學者在他們的性的民族志的研究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理論基礎,因此我們無法恢復他們的解釋。但很顯然的是,本文的後結構主義性學研究旨在批判學術上的實證主義和異己主義,並且主要是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啟示的。同時,殖民主義寫作在“落後與進步”的二元對立運作中,公然地或隱蔽地指責村民的道德問題。這裡,我將提到兩個關於性的殖民主義寫作的例子。

雷蒙德·弗里德里希·卡因德爾(Raimund Friedrich Kaindl)是奧匈帝國時期的奧地利歷史學家和民族志學者,他出生在烏克蘭的一個德國家庭。他是切爾諾夫策大學的教授,研究當地的歷史和文化,著作頗豐,其中的一本書研究了住在高山裡的烏克蘭少數民族赫蘇爾族(hutsuls)。雖然書中關於未婚青年的章節都值得摘錄,此處只摘取了一小段:

他們(男女青年)之間的關係變得親密,彼此出去約會。不久,剛從孩子長大成人的年輕人之間就發生了性關係,這是由於山中到處都有不良的行為和機會的例子。

在這種處境下,山區人口的道德問題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19 世紀初,在赫蘇爾族人中,一定有一妻多夫的情形存在,而女人經常被提供給陌生人享用。這些山區居民的健康狀況也很糟糕,整個社區都受到流行病的影響。但是,也有一種情形存在,那就是赫蘇爾族女人不會把自己奉獻給男人,除非她們喝醉了。最近,人們知道在塞利亞廷的一個村莊裡發生了這樣的事,一個男人使得他的女兒懷孕了。在扎比耶村裡,有一個赫蘇爾人,他有一個私生女,他又和他的私生女發生了關係,私生女生下他的孫女,他又和他的孫女發生性關係。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位母親告訴外國遊客她的女兒死於梅毒,這是很不得體的。²⁴

另外一個例子是俄羅斯醫生朱可夫斯基 (Zhukovskiy) 1870 年寫的 (它雖然不是民族志,但是很有表現力,是典型的殖民主義凝視下的寫作),他在烏克蘭中部的波爾塔瓦市工作。他說:

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工作時間還是休息時間,睡眠還是娛樂,她們[婦女]總是和像她們自己一樣粗魯的男人保持親密關係。男人無法抑制他們的慾望,也不習慣尊重婦女的權利。在其他社會,沒有哪一個地方有這麼多的未成年男孩強姦未成年女孩的事件。這種關於農村習俗的知識也有其政治目的。它把當地農民描寫為落後、墮落以及性過度的群體。這些觀點傾向於試圖改造殖民地的野蠻文化,實現殖民者先進文化的優越性永久化、合理化及自然化。

(四)“但為他的行為辯護的理由是她不是處女”:女性主義視角與權力問題

根據本文的題目,本研究主要致力於研究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的知識生產。由於女權主義認識論的發展,婚前關係研究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變,此處簡要回顧一下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女性主義認識論的發展處境。我將簡要概述女權主義研究給研究者所處的社會環境,特別是性別問題等方面帶來的啟示。

女權主義者利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收集的民族志數據,包括一些當代的田野調查資料,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強調了未婚青年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女人生活在厭惡女性的社會文化中,這種文化為女性的屬下身份辯護。

奧克薩納·基斯 (Oksana Kis) 在研究婚前懷孕和“維奇爾尼”傳統時強調了強迫事件的發生,年輕小伙子用暴力強迫女孩和他們同居,如果女孩不服從,小伙子會懲罰她;或是用女孩“款待”從其他村莊來的客人,即是強迫女孩和客人同居。在此情形下,年輕人是否有性行為的問題就變得很複雜了。婚前性行為可能並非自願,而是公開強迫和隱性強迫的行為。事實上,考慮到失去童貞或婚前懷孕帶來的嚴重後果,我們很容易相信女孩是不會冒著失去貞操的風險的,她們寧願避免和異性的任何親密接觸。正如研究者提及的那樣,有時候言情歌曲表達了她們對婚前性行為的恐懼。

這種新的女性主義研究獲得的新知識為性別不平等研究做出了貢獻。在上個世紀,儘管這種方法第一次成功地克服了現存的婚前關係知識的二元結構,但這種現代主義的女性主義研究方法仍然和以前的研究方法一樣,堅持性的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的理解,它繼續認為異性戀行為是一種“自然”的驅動力,在文化上是無條件的,但文化需求壓抑了這種驅動力。這種觀點是在“壓抑假說”的框架下運作的,它把性(異性)與自由聯繫起來,而不把它看作是話語權力的組織,這一點可以從下面引文中看出:

為了保護女兒的貞潔以及維護家庭的尊嚴,母親們從小就向女兒灌輸嚴格的社會道德價值觀,並指出如果她們按照自己的自然的性衝動行事,等待她們的將是諸多的懲罰。總的來說,保持年輕女孩對自己身體和性行為的無知是顛覆她們性慾的一種方式,儘管這不是萬無一失的方法。²⁵

(五)“這是男孩和女孩的遊戲”:建構主義的後結構主義(酷兒理論)方法

我在這裡提出的方法源自於建構主義的後結構主義對性的理解。正如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 意味深長地指出:“有人可能會說,對福柯的《性史》第一卷的誹謗包含這樣的論斷,即我們並不是一直都有性行為”。²⁶此處,我們暫且不討論“我們並不是一直都有性行為”的觀點,我要追問的是,考慮到當時的文化運作與“性”的現代觀念並不一致,民族志學家們在研究 19 世紀農村文化中的“性”時究竟做了什麼?此外,我還想考察的是,在學者將現代性觀念強加到農村文化中之前,

在非現代農村社會中，婚前生殖器愉悅和其他身體行為的主位語義系統是什麼？換言之，19 世紀的現代學者們認為什麼行為對於來自農村文化中的人來說是性行為？

為了理解婚前同居傳統如何與非現代文化的其他倫理結構或身體結構毫無疑問地協調一致，我考察了關於婚前同居的民族志資料，包括出版物和檔案資料。

事實證明，與民族浪漫主義或殖民主義範式所創造的民族志研究相比較，滲透在“現實主義”“解放”和“社會正義”等話語中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更多詳實的信息，而且，理應如此。現實主義的支持者被鼓勵“去描述一個真實的鄉村”，²⁷他們關注被調查者表達思想和觀點的具體方式。例如，馬爾科·赫里舍夫斯凱(Marko Hryshchivskyi)發明了一種“協議風格”，它包括農民精確表達和敘述的方式，然後，他把這些資料記在不同的閃存卡片上。之後，澤農·庫澤利亞(Zenon Kuzelia)對這些卡片做了系統的整理，加上注釋，編撰成一部兩集的專著。相反，19 世紀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主張性純潔的學者所寫的文章只包含他們自己的觀察和想法，用的是他們自己的語言而不是農民的語言。他們的文章的確提及和描述農民的文化，但反映的是民族志學者自己的說話方式和思維方式。因此，基於農民自己的敘述文本的主位語義系統研究是更為有益的。

在回顧民族志研究報告時，我做了一個重要的觀察。學者們的研究經常把婚前同居的習俗和婚姻關係做比較，並且把二者等同起來。其中一個研究的開篇這樣說道：

幾乎在遍佈德國的農村地區，尤其是在施瓦本斯地區，也被稱為施瓦茲瓦爾德，農民中有一個習俗，那就是女孩在結婚前很久就給予她們的追求者自由(譯者注：女孩和她們的追求者同居)，否則這就會變成丈夫們的特權。²⁸

在整個 19 世紀至 20 世紀早期的文學中，婚前同居的傳統被認為是“臨時婚姻”或“試驗之夜”，這種婚前同居在未婚青年的實踐和夫妻親密關係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繫。烏克蘭民族的浪漫主義話語和激進話語認為，這種習俗是古代落後的“臨時婚姻”的殘餘。根據這種民族志的親性的解釋，哈爾基夫學派的早期蘇聯性學家得出的結論是：在一個村莊裡，“一個年輕小伙子和一個女孩同居，會導致半滲透交合，並且常常導致性交”。²⁹這就是婚前的“背靠背”遊戲和婚姻交配是如何基於特定的性觀念和婚姻生活而在彼此之間劃上了等號的。

雖然學者們把這種婚前習俗和婚姻習俗描述得非常相似，甚至幾乎相同，仿佛它們是彼此的延續，但習俗的行為者，即來自農村文化內部的人，在考慮(和建構)婚前和婚姻時，將這兩種形式兩極分化，而且二者是互相排斥的。

值得強調的是，在民族志學者看來，青年男女的婚前親密行為和已婚人士的親密行為幾乎是一樣的，但對於來自非現代文化內部的人們來說，兩種行為是完全對立和互相排斥的。

我們仔細看看“背靠背”(prytula)和“狩獵”(puluvnaya)。在本文被引用的人種學文獻中，婚前肉體的快樂一直被稱為遊戲或娛樂。但是同一文本中，對夫妻間親密行為的描述與遊戲的概念完全相反。例如，“夫妻間不得玩耍”，他們的親密行為應該“真實的”“正確的”(‘in fact’ ‘for real’ ‘honestly’)，而不是“詭詐的”行為。³⁰

我認為，主位概念上的“背靠背”遊戲應該理解為專門為女孩和男孩設計的遊戲，而這種遊戲在婚後是禁止甚至會受到譴責的。如果在婚姻生活中，夫妻生育的孩子很少或孩子們的年齡間隔很長，人們會責怪丈夫和妻子。一位只有一個兒子的被調查者承認，有謠言說她或她丈夫“性生活方式不妥當”，而只是在玩“背靠背”遊戲：

因為當人們不想要孩子的時候，這是她們做的第一件事。他們同意不過正常夫妻生

活,或者根本不睡在一起(這也是存在的),如果他們睡在一起,他們也就是像男孩和女孩一樣玩“背靠背”遊戲,事實就是這樣的。這種處境經常發生。^③顯然,婚前的年輕人不必做任何“真實的事情”,他們只需要“玩耍”。

從以下觀察中,我們可以看出“普里圖拉”(prytula,意為“靠著”“緊緊擁抱”)和“波爾瓦尼亞”(puluvnaya,狩獵)的明顯差別:單詞“背靠背”(пригула)來源於同義動詞“背靠背”(prytuliatysia),在語境中,動詞“背靠背”(prytuliatysia)是“滲透”“穿過”的反義詞。因此,“普里圖拉”和性交兩詞的意思是相反的。

“真實事物”(即“交配”)與“背靠背”遊戲之間的一條明確界限是女孩失貞,它也是幾乎所有關於婚前睡在一起的民族志報道中的一個永恆的主題:“於是,女孩知道如何機智地保護處女膜不被傷害,她們只是玩‘背靠背’(prytula)遊戲”。^④這裡,我們可以注意到,在現代和非現代思維之間,民族志學者並不總是承認的另一個語義轉變。19世紀,農村社會很可能容忍和接受青年男女間的全部實踐——包括部分滲透為安全的、體面的行為,但現代思維把這些行為理解為性行為。在非現代思維那裡,如果一次實踐(行為)沒有造成女孩失去貞潔和懷孕,它就是“安全的”。“安全的”實踐被認為是無害的、可接受的、體面的。我認為,民族浪漫主義話語中發展出來的鄉村青年的“正派行為”類似於主位敘事,民族志學者和農民對“正派”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至於上述引文所描寫的部分滲透,受訪者一致認為這是婚前親密關係的最極端方式,但這種行為並不是因為懷孕的風險而被認為是危險的。儘管有確鑿的證據,^⑤人們通常認為,女孩沒有失去貞潔是不可能懷孕的。這種行為(普里圖拉 prytula 遊戲)之所以被認為是危險的,是因為在這種處境下,女孩可能被強姦,這意味著她“沒有保護自己”。

當我們在努力理解一個非現代性的語義系統,同時又試圖用現代語言來表達它的時候,我們應該明白,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沒有與婚姻實踐相悖的特定語義位置。性的現代話語重寫了它舊有的意義,同時又抹去了它的語義位置,將性的意義擴展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有一個關於非生殖性的性行為、肛交、前戲、撫摸或手淫等觀念,但是這些實踐並沒有脫離性觀念,也允許夫妻間有這樣的行為,這些行為也不被認為是與婚姻實踐(性行為)相對立,也不意味著只有年輕人在婚前才發生這樣的行為。

其次,“背靠背”遊戲並不被視為一種安全的性行為或是性行為的預備階段,而是被視為與婚姻實踐相對立的東西。在我看來,在非現代文化中的婚前生殖器實踐(男女親昵行為)可以更準確地概念化,這種概念化不是通過與婚姻的性行為聯繫起來或者做比較(至少不是排他性地只通過這種方式)來實現的,而是通過與兒童行為的一整套意義聯繫起來實現的。正如民族志學者告訴我們的那樣,孩子們也玩遊戲。後來民族志學者和性學家認為這些遊戲是性行為,並且很快把它作為一種疾病來治療。同時,在非現代思維的框架下,兒童觸摸生殖器被認為是一種無害的、自然的娛樂形式。通常處境下,父母並不擔心孩子玩弄生殖器,當民族志學者詢問這個問題時,父母的回答如下:“但所有的孩子都這樣做,他們逗樂自己,讓他們娛樂自己,否則還能怎樣呢?”^⑥從民族志學者的觀點看,他們的概念範式是由現代話語界定的,他們認為,這些包括同性刺激(民間稱之為“塞克利尼亞人”——“塞克爾”的意思是陰蒂)及男孩集體“手淫”(鄉村稱之為“製作啤酒”的遊戲,робити пиво)。^⑦

這一觀察得出的結論是,在性話語產生之前,婚前生殖器快感的範圍主要受到保護女孩貞操的必要性的約束。儘管民族志學者承認年輕人的婚前行為是性行為,但性話語的手段或詞匯並不能

準確描述或解釋後者。

四、本研究會如何影響異性戀的觀念

因為本文最後一段探討(異性戀)性行為的酷兒理論的穩定性異常,所以我們有必要解釋清楚本研究的結果會如何影響異性戀的觀念。

我認為,一旦民族志學者將現代的性模型強加於非現代文化,假定婚前同居的習俗是“臨時婚姻”或“婚前的性行為”,他們就把這些身體的實踐形式化為“標準的異性戀家庭模式”了。^①伊麗莎白·波維內利(Elizabeth Povinelli)關於歐洲人所做的澳大利亞本土人的儀式行為的研究,被歐洲人認為是性行為,這一點恰恰印證了現代異性戀模式的強度和規模之大。也有研究試圖將異性戀的現代觀念與非現代的婚前實踐縫合起來;但這種縫合留下了粗糙的“針眼”和依稀可見的接頭。實際上,二者是不一致的和互相矛盾的。例如,如果我們認為年輕人婚前自由選擇伴侶同居的習俗僅僅是為了結婚,那麼這似乎與年輕人的婚姻伴侶必須由父母選擇的強烈要求產生矛盾。

如果考慮到婚前肉體行為受到保護女孩貞操原則的約束,那麼人們可能會認為各種性行為的範圍甚至比民族志學家所描述的還要廣泛。但是,民族志學者的環境(在性方面的環境)和政治地位使得他們會優先考慮某種特定類型的婚前性行為,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婚前性行為。例如,沒有關於“成年男青年如何互相撫摸,成年少女如何互相撫摸”的信息,我們僅僅知道村民們太害羞了,不敢與民族志學者分享這些信息。^②

此外,我們的確明白(轉述金·M·菲利普斯和巴里·雷伊的觀點),非現代社會似乎有著許多構成今天所謂的(異性戀)性行為的東西,但非現代社會可能又無法將這些東西整合到這種性結構中。正是19世紀的民族志學者將這種現代的(異性戀)性觀念篆刻在非現代的語義系統之中。

① Сержпутовский А. Жизнь молодежи и брак в с. Лоски, Кролевецкого уезда, Черниговской губ.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1910 года. По сообщениям местного крестьянина Евдокима Даниловича Кириченко. Научные архивные фон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кусствознания,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и и этнологии им. М. Рильского, НАН Украины, Ф. 1-5. Ед. хр. 1922, pp. 1-2.

② ③ Н. Welter, Folklore de l'Ukraine: Usages, Contes et Légendes, Chansons, Proverbes et Jurons, in *Κρυπτα ἔθια: Recueil de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 V, Paris, 1898, pp. 3-4.

③ Боржковский В. Парубоцтво как особая группа в Малорусском сель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Киевская Старина XVIII (Август), 1887, p. 775.

④ ⑥ ⑧ Fischer, Friedrich Christoph Jonathan, *Über Die Probenächte Der Deutschen Bauernmädchen* (2nd edition), Leipzig: Adolf Weigel, 1901, p. 7; p. 7; p. 4.

⑤ Маєрчик М. Полтавщина 1997. Ф. 1, Оп. 2, Од. 36. 4006, Архів Інституту народознавства НАН України, 1997, p. 10.

⑦ Haraway, Donna,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3), 1988, pp. 575-599.

⑧ Lykke, Nina, *Feminist Studies: A Guide to Intersectional Theory, Methodology and Writing*,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5.

⑨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The Use of Pleasure*, Robert Hurley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pp. 3-4.

⑩ Phillips, Kim M. and Barry Reay, *Sex Before Sexuality: A Pre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11, p. 7.

⑪ ⑬ Povinelli, Elizabeth A, *The Cunning of Recognition: Indigenous Alterities and the Making of Australian Multi-*

- cultural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2.
- ⑫ Маркевич А. *Меры противъ вечерницъ и кулачныхъ боевъ в Малороссии. Киевская Старина X (9)*, 1884, p. 178.
- ⑬ Шафонский А. *Черниговскаго намѣстничества топографское описаніе съ краткимъ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ъ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ъ описаніемъ Малыя Россіи*. М. Судіенко(ed.), Киев.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й типографіи, 1851, pp. 27-28.
- ⑭ Нора, Пьер, *Предисловіе к Русскому изданію. In Франция - Память*, by Пьер Нора, Мона Озуф, Жерар де Пюимеж and Мишель Винок, пер. с фр. Д. Хапаева, научн. конс. перевода Н. Копосов, 5-16. Новая 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оллекция "Память Ве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9, p. 5.
- ⑮ Mosse, George L,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Middle-Class Morality and Sexual Norms in Modern Europ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1.
- ⑯ Афанасьев-Чужбинский А. "Быт малорусскаго крестьянина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в Полтавской губерніи)", in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издаваемый имп. русским геогр. общ.*, Вып. 3:19-46.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Э. Праца, 1858, p. 32.
- ⑰ *Поездка в Южную Россію. Очерки Днепра* (2nd), Vol. 7,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рмана Гоппе, 1893, p. 28.
- ⑱ Чубинский П. *Труды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іи в Западно-Русскій Край, снаряженной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мъ русскимъ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ъ обществомъ*, В 7-т. Под набл. П. Гильтебрандта. Vol. 7 (ч. 2). 7 vols,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7, p. 451.
- ⑲ Сумцов Н. "Досветки и посиделки", in *Киевская Старина*, no. III (Март), 1886, p. 440.
- ⑳ ㉑ Кузеля З. "Від Впорядчика", in *Дитина у звичаях I віруваннях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 Матеріали з полудневої Київщини*, У 2-х томах, by Mr.Г., обробив Зенон Кузеля, 1, Матеріали до Українсько-Руської етнольо Г іі. Т. VIII, Львів: Наукове товариство ім. Т.Г. Шевченка, 1906, p. 4.
-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Mr. Г, *Дитина у звичаях і віруваннях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 Матеріали з полудневої Київщини*, У 2-х томах, Обробив Зенон Кузеля. Vol. 1. 2 vols., Матеріали до Українсько-Руської етнольо Г іі. Т. VIII, Львів: Наукове товариство ім. Т. Г. Шевченка, 1906, pp. 96-97; pp. 97-101; p. 97; p. 100; p. 67; p. 67; p. 68.
- ㊱ Руденко Н. "Листи В. Ястребова до Ф. Вовка", in *Південна Україна XVIII-XIX століть*, 1(7), Записки науково-дослідної лабораторії Історії Південної України ЗДУ. Запоріжжя: РА "Тандем-У", 2000, pp. 48-49.
- ㊲ Kaindl, Raimund Friedrich, *Die Huzulen. Ihr Leben, Ihre Sitten, Und Ihre Volksüberlieferung*, Wien: A. Hölder, 1894, pp. 8-9.
- ㊳ Worobec, Christine D, *Temptress or Virgin? The Precarious Sexual Position of Women in Post emancipation Ukrainian Peasant Society*, *Slavic Review*, 49 (2), 1990, p. 233.
- ㊴ Butler, Judith, *Sexual Inversions*, in John D. Caputo and Mark Yount (ed.), *Foucault and the Critique of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1.
- ㊵ Гуревич З., Гроссер Ф. *Сучасне полове життя (соціально-гігієнічне дослідження)*, Харків: Державне видавництво України, 1928, pp. 43-44.
- ㊶ Mr. Г. 1906, 1:97.

作者簡介: Maria Mayerchuk, 烏克蘭國家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高級副研究員, 基輔莫希拉國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女權主義批判: 東歐女權主義和酷兒研究雜誌》主編。

譯者簡介: 歐陽翠鳳, 江西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南昌 330013

[責任編輯 陳志雄]